

中国古代诚信思想浅析

张锡勤

〔摘要〕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,信被看做是做人的根本,是事业成功的保证,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、维持的根本,是有效治理国家、维护统治的保证。诚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根本,是道德修养的关键,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。当前,诚信道德建设应从重信、守信入手,进而培育人们诚的品德,建立对诚信的心理认同。

〔关键词〕 诚信 道德 传统

〔中图分类号〕 B82-02 〔文献标识码〕 A 〔文章编号〕 1007-1539(2004)01-0019-03

在中国古代,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。但由于诚与信的含义、要求有相同、相通之处,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,因此后来逐渐连用(如《荀子·不苟》有“诚信生神”的句子)。今语中的诚信,其基本含义是诚实守信,这与古代的诚信道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。因此,弄清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,对今天建设新型的诚信道德无疑是有意义的。

—

在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体系中,诚是信的基础,故有“不诚者失信”、“诚故信”之说。在古人看来,只有诚“有于己”,信方能“见于物”。因此,诚的内涵比信更广。所以朱熹说:“信不足以尽诚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六)但为了叙述方便,下面先说信。

信与诚一样,其基本要求也是真实不欺,但它更侧重于对人讲话的真实不欺,要遵守自己对他人的承诺。《论语》讲“言而有信”(《学而》)、“言忠信”(《卫灵公》),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。在这方面的具体要求是:(一)对人言要真实,“无便曰无,有便曰有。若以无为有,以有为无,便是不以实,不得谓之信”^[1]。要做到“君子之言,信而有征”(《左传·昭公八年》)。(二)说话算数,不违背诺言,做到“有所许诺,纤毫必偿;有所期约,时刻不易”^[2],切不可“面诺背违”。(三)“信是言行相顾之谓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一),要做到言行一致,表里如一。信之德要求人们说话和办事都诚实可靠。所以,朱熹弟子陈淳说:“信有就言上说,是发言之实;有就事上说,是做

事之实。”^[3]所谓“做事之实”,简言之就是以诚信态度对待工作任务,包括按时按质完成任务,保证工作、产品质量等内容。

虽然,迟至汉代董仲舒方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,但早在先秦先哲们已将信视之为重要道德规范。孔子一再提倡忠信,《论语》记载说: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(《述而》)信被列为四教之一;孟子将信看做是五伦中朋友一伦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;《吕氏春秋》则有《贵信》篇专门论信。中国自古重信是基于以下原因。

其一,古人认为,信乃是一个人立身做人的根本。早在春秋,便有“失信不立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)的观念,认为人能守信方能立足于社会。这是因为,人能守信,其言行可靠,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,与他人建立并保持正常的交往。反之则不然。孔子曾说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輹,小车无轨,其何以行之哉?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“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,行矣。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,行乎哉?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他反复强调,一个人要想在社会群体中立足,处处行得通,就必须守信;一个失信的人必将自我孤立,在社会上寸步难行。

其二,古人认为,信是事业成功的保证,只有以信实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、事业,不掺假、不作伪,才能收到实效。孔子在谈事业时最终落实为“信以成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。其他人也说:“言非信则百事不满(成)也。”(《吕氏春秋·贵信》)“人不信

实,诸事不成。”^[4]信不仅是做人的根本,也是做事的根本。

其三,信是正常的社会秩序赖以建立、维持的根本。古人曾一再指出,人际关系如果缺少了信,社会秩序必将一片混乱,其害不可胜言。“君臣不信,则百姓诽谤,社稷不宁。处官不信,则少不畏长,贵贱相轻。赏罚不信,则民易犯法,不可使令。交友不信,则离散郁怨,不能相亲。百工不信,则器械苦伪,丹漆染色不贞。”(《吕氏春秋·贵信》)“若君不信以御臣,臣不信以奉君,父不信以教子,子不信以事父,夫不信以遇妇,妇不信以承夫,则君臣相疑于朝,父子相疑于家,夫妇相疑于室矣。大小混然而怀奸心,上下纷然而竞相欺,人伦于是亡矣。”(《傅子·义信》)只有人皆守信,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怀疑、欺诈、戒备,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和谐关系。这是古人重信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其四,古人认为,信是统治者、执政者有效治理国家、维护统治的根本保证。这是因为,只有统治者、执政者兑现自己的诺言而不给民众以“口惠”,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、拥护。只有统治者、执政者守信,做到有法必依,刑赏必信,不随心所欲、朝令夕改,才能使民众有所适从,从而做到令行禁止,人人遵纪守法。《论语》有这样的话: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。”(《子张》)只有统治者讲信、守信,才能支使民众。古人的结论是:“王者体信,而万国以安;诸侯秉信,而境内以和。”^[5]取信于民乃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。对君主而言,“祸莫大于无信”,“周幽以诡烽灭国,齐襄以瓜时致杀”^[6],便是著名的历史教训。因此,当子贡向孔子“问政”时,孔子的回答是,到万不得已时,“食”与“兵”皆可去,惟独“信”不可去。在他看来,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而言,“信”比“食”与“兵”更为重要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专有《贵信》一篇,它实际上是先秦信论的总结。在这篇文章中,作者为强调信的重要,曾将信视为“天道”。但是,中国古代劝诫人们重信、守信的众多论述,大多数带有功利色彩,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。它告诉人们的是,从长远来说,守信必然会带来利益和成功,而失信则必然带来损失与失败,要求人们从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而重信、守信。事实上在历史上有远见的工商业者、金融家(如山西票号)重视品牌质量,讲求信誉,所考虑的正是实际利益。明智的统治者标榜、重视“取信于

民”,所考虑的更是自身的利益。劝诫人们从实际利益出发而重信、守信,乃是中国古代信论的特色。

二

从根本上说,一个人只有诚于内方能信于外,所以,诚是信的基础。在诚信规范中,诚更根本。

诚是真实不欺的品格。中国古代思想家先后对诚做了如下解释:“诚者,真实无妄之谓”^[7];“诚,实也”^[8];“诚者,不欺者也”^[9];这些解释其义大体相同。诚即是有真心、真言、真行,不存伪诈。《庄子·渔父》以真与诚互释,是精当的。后来,程颐以“实有是心”、“实有是事”释诚,王守仁提倡“此心真切”,吕坤强调“实言、实行、实心”,都是对诚的简洁而精当的概括说明。

诚的具体要求首先是不自我欺骗。《大学》说:“所谓诚其意者,毋自欺也。”这就要求人们不以暗中作恶无人知晓而自安,不以超过实际的虚名而自喜,不以出于不正的动机而取得的某种效果而自夸,不以伪善为荣,不文过饰非,不为自己的恶行、过失辩解、开脱,不以不知为知。古人还认为:“知善之可好而勿为,是自欺;知不善之可恶而姑为之,是自欺。”^[10]在道德上知而不行、言行不一,也是自欺。总之,它是要人做到心口、表里、名实如一,暗处明处如一,高度坦诚,心地洁净。对诚而言,更重要的是不欺骗他人。其基本的要求是不以谎言骗人,不弄虚作假、欺世盗名,对事不敷衍塞责。不仅不可说谎话、假话,而且不说那些不能兑现或无用的大话、空话。诚的这些要求与信是相同或相互交叉的。此外,诚还表现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、工作真心实干,全心全意,“实用其力”。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务实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。

有见于“天道流行,自古及今,无一毫之妄”,因此,《孟子》和《中庸》先后将诚视为“天道”,又将追求诚看做是“人道”。这便是:“诚者,天之道也;思诚者,人之道也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对此,后代儒者多有发挥,有人因此将诚置于本体地位(比如,朱熹认为诚乃“天理之本然”,王守仁认为“诚是心之本体”)。中国古代思想家如此强调诚的价值意义,凸显诚的地位,是因为:

其一,诚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根本。只有出于真诚,才能形成道德信念,养成道德品质。一切真正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真诚,有诚方有德、善。诚

乃是德性形成、增进的内在保证、驱动力。朱熹曾形象地比喻说：“如播种相似，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，方会日日见发生。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，如何会发生？”“若不实，却自无根了，如何会进？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四）既然诚实是一切德善的“种子”，所以古人一再说：“孝而不诚于孝则无孝，弟（悌）而不诚于弟（悌）则无弟（悌）。”（同上）“诚于家则孝友，诚于国则忠良，诚于好善则进德，诚于好士则得人。”^[11]对此，周敦颐曾做了高度概括，这便是：“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。”诚乃是一切道德的本原。

其二，诚意乃是道德修养的关键。只有真心实意认同道德准则，去从事道德修养，它才能有实效，否则，所谓修身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行为。正如朱熹所说，在《大学》所列的“八条目”中，“诚意乃恶与善之关”，只有“过此一关，方是人不是贼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五），“修齐治平”才能收到实效。

其三，诚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。正如二程所说：“学者不可以不诚，不诚无以为善，不诚无以为君子。修学不以诚则学杂，为事不以诚则事败。”^[12]“诚无不动者。修身则身正，治事则事理，临人则人化，无往而不得。”^[13]这是因为，只有出于诚，才能对事真心实干，真诚务实，脚踏实地，有始有终，才能激起巨大的热忱、激情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如曾国藩所说，只要有至诚之心，“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”^[14]。

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，诚不仅是基本的、重要的道德规范，又是道德修养所应有的基本态度，也是至高的道德境界。它所要求的是高度的自觉，是不带功利性的。中国古代先哲重诚反伪，应该说是抓住了道德建设的根本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。与信相比，诚无疑是更高的要求。

三

毋庸讳言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，相当程度上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。弄虚作假、尔虞我诈以至坑蒙拐骗等等行为，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，而且逐渐蔓延到行政、学术等领域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更值得重视的是，由于诚信缺失，一方面人人深受其害，一方面人人又往往以其道施之他人、对待他人。由于在不诚信的环境中诚信者因诚信而蒙受损害，于是“学乖”而变得不诚信。这便是不诚信进一步促成

不诚信。诚信缺失乃是今天建设市场经济、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。

如何解决诚信缺失的问题，自然首先应从机制上、制度上入手。正如近年来许多学者多次提出的那样，当务之急应建立、完善诚信信息系统；建立、完善惩罚机制，使不诚信者及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至于再度得逞，使诚信者因诚信而得益。但从源头上来说还应该从道德观念层面解决问题，建立对诚信的心理认同。

就诚信道德建设而言，逻辑上应该是由诚而信，但实施时则不妨从重信、守信入手。如前所说，古人劝诫人们守信，多从利害角度施教，带有功利主义色彩。这无疑更易发挥劝诫、诱导功能，使人因实际利益而接受诚信教化。今天，我们应通过各种方法、途径，让人们深知失信之害、守信之利。使“失信不立”、“信则人任焉”、“人不信实，诸事不成”、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”、“民无信不立”、“祸莫大于失信”等一类千古不易的格言深入人心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，成为共同的内心信念。让人们普遍从理性上认识到，信不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，也是正常人际交往和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，一个失信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。应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懂得，失信之得是一时的、侥幸的，早晚要受到惩罚，而守信之得是长远、可靠的。当然，这种有“德”方能“得”、以“德”获“得”的理念尚只是初级的道德理念，有待于进一步提升。应培育人们诚的品德，让人们对人、对事时时出于真、出于实，使重信、守信完全出于内心自觉、出于自然。这是更长期、更艰巨的任务。

（作者：张锡勤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）

参考文献

- [1][3] 陈淳：《北溪字义·忠信》。
- [2] 袁采：《袁氏世范》卷二，《处己》。
- [4] 石成金：《传家宝》二集卷一，《人事通》。
- [5][6] 傅玄：《傅子·义信》。
- [7]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。
- [8] 戴震：《孟子字义疏证·诚》。
- [9][14] 曾国藩：《曾文正公全集·日记类钞》卷上。
- [10] 范浚：《慎独斋记》，《宋元学案》卷四十五。
- [11] 姚莹：《复座师赵分巡书》，《东溪外集》卷二。
- [12] 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五。
- [13] 《河南程氏粹言》卷一。